

清史编年

第十卷
(同治朝)

同治朝

同治朝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清史编年

第十卷

同治朝

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本卷编写 杨东梁 谭绍兵 黎烈军



B125178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史编年. 第 10 卷, 同治朝/杨东梁等编写.
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0.8

ISBN 7-300-03107-2/K·243

I. 清…

II. 杨…

III. 中国-近代史-编年体

IV. K252.0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7951 号

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

清史编年

第十卷

(同治朝)

本卷编写 杨东梁 谭绍兵 黎烈军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)

发行部: 62514146 门市部: 62511369

总编室: 62511242 出版部: 62511239

E-mail: rendafx@public3.bta.net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22.125 插页 2

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545 000 印数: 1-1 000

总定价 (共 12 册): 498.00 元 本册定价: 40.0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序 言

郭影秋

“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。”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就是每个朝代的更迭，都要尽快地为前朝修史，使我们祖国的悠久历史，得以世世代代地用文字记载下来，为我们今天研究祖国的历史提供丰富的史料。

汉代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《史记》，为“二十四史”之冠首。它详近略远，求真考信，记述了汉武帝以前中华民族的历史。全书“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《史记》无论从史学角度或是从文学角度，都给后人树立起一个治学的典范。《史记》是一部传记体通史，而断代史应该从东汉班固所作的《汉书》开始，以后又有范曄的《后汉书》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至唐朝初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召集名流学者，设馆撰修《晋书》等前朝历史，辅臣房玄龄、褚遂良以及名宿令狐德棻、李延寿等，均参与其事。唐太宗还亲自为晋宣帝（司马懿）、武帝（司马炎）之二纪及陆机、王羲之的两传写了“制曰”，故《晋书》开卷即题“太宗文皇帝御撰”。这样，给前朝修史便成为历代开国的成规，开始了官修前朝史的先例。此后，宋修唐、五代史，元修宋、辽、金史，明修元史，清修明史，一朝接一朝，前后相续，修成了现存的“二十四史”，总括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

史料和经验。在我国伟大文化遗产宝库中，“二十四史”是一部相互接续、自成体系，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巨著。但是，以往各朝官修断代史，都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。在这些史书中，贯穿着宿命论、循环论、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思想，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，甚至在体例和取材上还有很多可议之处。诚然，它们不可能发现和阐明中国历史的客观规律，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。因此，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，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。1914年，当时的北洋政府开设清史馆，着手编纂《清史》，至1927年编成初稿，命名《清史稿》。《清史稿》虽然搜辑排比了有清一代史事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但此书错误缺漏甚多，有的观点也极荒谬。作为民国的官修史书，仍把武昌起义称为“谋乱”，将革命党人失败牺牲谓之“伏诛”等等，根本违背了已经改变的社会现实。所以，《清史稿》刊行不久，即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，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公认，未能进入“正史”的行列。

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重视历史研究的，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‘历史的启示’；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，甚至比黑格尔，都更重视历史。”但是，我们研究历史，为前朝修史，其目的和方法同历代修史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。我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研究社会历史，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。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，就在于要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，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的认识，充实和丰富人们的思想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四十年前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时，明确地把研究历史，即“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，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”，当作了解中国国情，追溯渊源，正确把握现实的重要基础。

近几年来，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，无论从论文专著、发表出版，档案文献的整理汇编，或者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队伍的加强等方面，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。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、具有较高水平的《清史》，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，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，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，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
清朝历史年代漫长，前后近三百年，各种类的典籍、档案、文献、资料等浩如烟海，在整理、归纳、编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，对其深入研究，当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。而这项任务，决不是少数人和某些单位所能单独胜任完成的。如果动员起全国的清史研究力量，在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开展研究，我确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，是能够完成编写《清史》这一光荣任务的。

清史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《清史编年》，开始陆续出版。它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，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历史爱好者提供参考用书，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。我国传统的史书，有各种不同的体裁，如纪传体、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等。所有这些体裁，优缺点俱备，各有千秋，它们都以自己的特点立足于历史典籍的宝库。例如纪传体的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编年体的《左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纪事本末体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等，都是我国史籍中的辉煌篇章。

《清史编年》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，但它与旧的编年史书有所区别，主要在于它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，整理、分析、扬弃和归纳繁杂的清代史料；坚持实事求是，力求准确地揭示清王朝兴起、发展、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。当然，这项工作还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摸索，明显地取得上述的这种效果，还须加倍努力，锲而不舍地做许多艰苦细致的

工作。

《清史编年》依据之史料主要采自官书。清代官书汗牛充栋，卷帙浩繁，仅一部《清实录》即多达四千三百卷。官书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，忌讳直言，因此或者删节要害，或者粉饰真相，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但官书史料齐备完整，时间较为准确，来源于档案文件，大事一般不漏，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。《清史编年》取材以官书为主，兼采文集、笔记、稗史、碑传、谱牒、档案等，以便互相印证补充，借以辨别历史真象，充实丰富编年内容，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。

无论如何《清史编年》毕竟是历史科学这个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，我祝愿它茁壮成长，为实现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前 言

李文海

《清史编年》从1985年出版第一卷，到现在12卷全部出齐，由于诸多原因，前后经历了15年时间。如果从开始组织力量编撰此书的1980年算起，则已经整整20年了。

20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这有两层意思。一层意思是老话：在历史长河里，20年时间只不过是转眼一瞬，套用我读小学时做作文常用的八股腔，真是“如白驹之过隙”；但对于个人来说，却占用了全部学术生命的三分之一左右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。还有另一层意思：用20年的时间搞一部书，在如今某些“倚马万言”、一年可以出好几部著作的才子们，或那些善于抓住“商机”、个把月就可以编出一部什么“大全”之类的“攒书家”看来，一定会觉得不但迂得可笑而且傻得可怜。但是，历史上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编著一部书，其实倒是很普通、很常见的事情。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，前后写了14年。班固的《汉书》，经过25年的努力始告完成。被后人誉为“史家绝作”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写作过程历时19年。谈迁的《国榷》，由于经历了特别的坎坷，写作时间竟长达35年之久。这里我必须赶快申明，提到这些，丝毫没有要把这部《清史编年》挤进那些史学经典和学术巨著行列的意思，只不过是就时间论时间，从《清史编年》的经历生发出一点这样那样

的感慨。

编写《清史编年》的任务，最早是由我们敬爱的老校长、著明明清史专家郭影秋同志提出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董必武以及稍后的邓小平同志等，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。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，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，以便集中力量、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《清史》。郭影秋同志提出，编写《清史》，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，要在搜集资料、理清史实的基础上，先编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，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。根据影秋同志的意见，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、史松同志牵头的专门力量，从事此项工作。这项工作的成果，就是这套由戴逸同志拟定书名的《清史编年》。

《清史编年》编撰的思想和写作原则，影秋同志在《序言》中已经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，修订再版本将这篇《序言》列于卷首，同时重印了原书《凡例》，以便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。

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。近年来，清史这个领域，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，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。这种现象的出现，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。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。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，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，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，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。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，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，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。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，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军事、外交、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，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、延伸而来。可以说，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，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。清

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《清史编年》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诸多科研成果之一。这是集体研究的成果。第一卷由史松、林铁钧负责编写；林敦奎、徐滨、向晓、罗远道、曹月堂、胡又环、陈洪等同志曾先后提供了参考资料。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林铁钧、史松主编；陈洪、胡又环、罗远道、孙家骧、袁定中、向晓、曹月堂、徐滨等同志参加了编写。第四卷由史松主编；向晓、胡又环参加了编写。第五、六卷由郭成康编写。第七卷由林铁钧编写。第八卷由陈桦编写。第九卷由尹福庭编写。第十卷由杨东梁、谭绍兵、黎烈军编写。第十一卷由潘向明编写。第十二卷由迟云飞编写。

黄兴涛同志认真审阅了第六卷以后的各卷书稿，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。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孟超、刘仰东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。没有他们的努力，这部书要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版，实在是极不容易的。

2000年2月25日于

中国人民大学林园

凡 例

一、《清史编年》所采用之文献史料，经考核查对，均注明出处。凡未注出处者，即引自清代历朝《实录》。

二、全书以清朝年号纪元，农历纪事，标明干支、公元，按年月日顺序逐条编撰，某些事件则集中归纳于一条或数条。

三、全书纪事以日期为基限，凡日之不能定者附于“是月”，月之不能定者附于“是春”、“是夏”等，春、夏又不能定者附于“是年”，年不能定者不记或作说明。

四、凡本书所用文献史料之来源、重要人物之简历、满文名称之汉译、说法迥异或存疑待考的重要史料以及充实正文的其他补充文献等，均酌情予以必要的注释。

五、为保存文献史料的完整及便于使用，本书较多地引用了原文。凡加引号者，除予以标点外，均保留原貌，不改一字。书中使用“谕”、“御”、“朕”、“敕”、“奏疏”、“得旨”等，乃沿用文献之术语。原文中对抗清力量 and 人民起义诬称“贼”、“寇”、“叛”、“逆”等词，已为读史者所熟知，一般未予改换。

六、全书以突出各朝具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为主，同时兼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历史事件。包括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之设置、沿革、裁并，重要官员之任免升调罢革及品级变更等；主要典章制度，如世爵、官制、铨选、计典、钱粮、赋役、征榷、仓储、漕运、礼仪、科举、学校、兵制、军政、驿递、保甲、刑名、秋审；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，如蠲缓杂课、八旗生计、治河、水利、屯垦、海禁、开矿、鼓铸、贸易，以及人口对策等；其他如每年人丁户口、田亩赋税、兵饷军需、铸钱制钞等综合数字，

均分别予以归纳汇集，按时间记述。

七、民族关系为清王朝建立和巩固对全国统治的重要内容。凡满汉关系，清廷对少数民族的政策，以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之交往，包括册封、朝觐、入贡、规章制度和双方之军事行动等，都予以记述。立国之初，独立于清朝之国内其他政权，记其主要活动。

八、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，凡规模较大、影响甚广者皆记。确知其性质者，如农民阶级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武装行动，一般称为“起义”、“农民起义军”。不能确知其性质者称“起事”。

九、清朝统治者（包括宗室皇族）之活动，凡皇帝之即位、逝世及其他重要活动，包括政令之发布（如诏书、上谕、朱批、敕文）、出巡、亲征、狩猎、庆典、后妃册封以及宗室内部相互倾轧、继嗣斗争等，视其内容或详或略记之；凡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等之爵位封袭降夺，择其重要者记之。

十、重要之政治事件（包括重大案件）及军事活动、其影响大历时长者，则详细记其始末。重要学者之主要活动、重大科技发明创造、重要学术著作之完成、重要官书之编定、重大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等皆记。

十一、对外关系，凡使臣互相往来、贡赏、通商、交涉、订约、传教士来华以及抵御外国入侵活动等等，择其重要者记述。

十二、清历朝帝王，均书其年号，如顺治朝之福临称顺治帝，雍正朝之胤禛称雍正帝等；各地之南明政权，也记其年号，如南京之朱由崧称弘光帝，西南之朱由榔称永历帝等。

目 录

同治元年	壬戌	公元 1862 年		(1)
同治二年	癸亥	公元 1863 年		(61)
同治三年	甲子	公元 1864 年		(101)
同治四年	乙丑	公元 1865 年		(175)
同治五年	丙寅	公元 1866 年		(243)
同治六年	丁卯	公元 1867 年		(305)
同治七年	戊辰	公元 1868 年		(363)
同治八年	己巳	公元 1869 年		(401)
同治九年	庚午	公元 1870 年		(453)
同治十年	辛未	公元 1871 年		(521)
同治十一年	壬申	公元 1872 年		(565)
同治十二年	癸酉	公元 1873 年		(607)
同治十三年	甲戌	公元 1874 年		(653)

同治元年 壬戌 公元 1862 年

正月初一日甲申（1月30日）

谕令恭亲王奕訢等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，“以示优异”。又以礼亲王世铎为内大臣，命兵部尚书麟魁、两江总督曾国藩协办大学士。

初二日乙酉（1月31日）

颁两宫皇太后懿旨曰：“皇帝虽在冲龄，亦当存民饥民溺之思，不可稍耽安逸。前以年饷浩繁，度支不足，不得已议亩捐、厘捐之举。地方有司，不知善为经理，暴敛横征，漫无限制。方冀逆贼荡平，轻徭薄赋，与吾民共登衽席，何堪贪吏朘削，竟至民不聊生，殊堪痛恨！已屡谕皇帝飭令各该省督抚，酌量撤留，并将殃民官员严行查办。至各直省地方水旱偏灾，近因经费不充，地方官或至讳匿不报，仍复征收，四野鸿嗷，岂容坐视！”“皇帝深居九重，岂能周知民间疾苦？是在内外文武大臣以及翰詹科道有言事之职者，博访周谘，随时具奏，使闾阎幽隐，咸得上达朝廷，迅速办理，以慰视民如伤之念。”

本日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湖南龙山入湖北来凤，与贵州义军李洪会合。

本日，缓征直隶武清、宁河、东安等二十六州县欠收村庄粮赋、地租，并展缓原贷仓谷；缓征山东临清、济宁、历城等五十七州县暨德州、东昌、临清、济宁四卫各屯庄本年上忙额赋并地

租、杂课。

初三日丙戌（2月1日）

福建总兵秦如虎攻入浙江平阳县，攻占金钱会发源地钱仓镇。金钱会创于咸丰八年，首领赵起生于钱仓贫苦之家，与朱秀三、缪元、谢公达等结为异姓兄弟。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，赵起举义于钱仓，八月二十八日，攻占温州府城，旋退出。十二月初五日，再下平阳县城。闽浙总督庆瑞急调福建记名道张启瑄、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及闽安协副将吴鸿源部水师攻之。本日，秦如虎部攻入平阳，谢公达战死，清军遂占钱仓。后赵起赴处州（今浙江丽水），引太平军南下，六攻府城不果，旋太平军北上，赵起被俘遇难。

初四日丁亥（2月2日）

苏州儒生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忠逢朝将刘肇钧，论攻取上海事，书云：“夫用兵之道，当舍紧而攻瑕，避锋而挫弊。与我争天下者，菁（清）也，而非英、法也。于今天下未宁，方将经略中原，中原之疆土十仅克复二三，所欲兵力者甚多，则我之待夷宁和而毋战，不宜轻失外援以启边衅。”“今者洋人调兵筹饷，悉力一心，其气方张，其锋甚锐，若我兵侵伐其界，岂肯成和约而骤然罢兵？若夷人战而败，必思报复，或幸而胜，则我与洋人前日之惠，委诸草莽。然则尚（上）海必不可取乎？曰：‘非也。’畹请谨献其策，曰明告而严讨之；阳舍而阴攻之，徐以图之，缓以困之。”“是则尚（上）海非真不取也，而畹终以和之说进者，诚有见于天下大局所关也。”“是我虽得志于尚（上）海，而于力争尚（上）游之大局反有所阻，此畹所不取也”，“今洋人特知自守，决不远出一步，曾郭（国）藩之踞安

庆，乃真心腹大患耳！”^①

初十日癸巳（2月8日）

因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并力东趋，松江、上海“危急万分”，遂谕令曾国藩飞催曾国荃剋日督带老湘勇八千人援上海。谕称：“苏常沦陷以后，上海即系南北粮台饷源所出，著即迅速保护。”又令左宗棠赶紧进兵，以图牵制，令曾、左催促鲍超一军迅攻宁国，以打通广德至湖州一线。再令江宁将军都兴阿等派水师艇船速赴吴淞口驻泊，令闽浙总督庆瑞饬副将吴鸿源率勇一千五百人由海道迅赴上海。

又谕：“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。上海城守事宜，业经薛焕筹办，其松江等城应如何竭力严防，藉资犄角，并就现有兵力相机迎剿，以遏贼焰之处，均著薛焕悉心办理。至借师助剿一节，业谕总理衙门与英、佛（法）驻京使臣商酌”。“上海为通商要地，自宜中外同为保卫。军务至紧，若必俟总理衙门在京商酌转致稽迟，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，剋日办理，但于剿贼有裨，朕必不为遥制。其事后如有必须酌谢之说，亦可酌量定议，以资联络。”

十一日甲午（2月9日）

蠲缓江苏山阳、阜宁、清河等六十三州县暨淮安等九卫被兵、被水、被旱地方新旧额赋并杂课。

十三日丙申（2月11日）

据麟魁、沈兆霖查办奏称，陕甘总督乐斌办理撤回剿抚事

^① 《黄畹上刘肇钧禀》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太平天国》，第二册，767—770页。

宜，其所奏报与该省舆论、士庶呈词、弁兵口供均不相符；又西宁、碾伯两县士民控告官兵并未剿办撤回。本日谕云：“乐斌身任封疆大吏，纵匪殃民，捏报冒功。已据麟魁等查讯得实，殊堪痛恨，著先行解任，仍交麟魁、沈兆霖并其余被参纳贿营私各款，一并彻底根究，务期水落石出，以成信谳而儆官邪。”旋以沈兆霖署陕甘总督。

十四日丁酉（2月12日）

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为“广招兵马，早复皖省”^①，命马融和、张乐行进至淮北后，继派扶王陈得才、启王梁成富、遵王赖文光、祐王蓝成春等率部西征豫、陕，自安徽颍州（今阜阳）入河南，本日攻新蔡。

十五日戊戌（2月13日）

英、法驻沪外交官及军队指挥官于法国领事馆召开“防务会议”，议兵力配置。与会者英方有驻华舰队司令何伯及莫德、韦伯等军官，法方有驻华舰队司令卜罗德、驻沪陆军指挥官德奥罗格及代理领事爱棠。议决由英军防守美、英租界及北门（包括附近城墙）；法军防守法租界、县城、董家渡；吴淞口则由两国海军共同防守；清军负上海城防之责，在未通知各领事之前，清军不得调动。

十六日己亥（2月14日）

协办大学士、兵部尚书麟魁卒于兰州，谕令照大学士例赐恤，开复任内一切处分，谥文端。

^① 《赖文光自述》，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：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，558页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版。